

大饑荒之後的緊急措施： 計劃生育政策的重啟 (1962-1966)

• 霍炫吉

摘要：本文旨在聚焦大躍進之後中國重啟的計劃生育政策，分析其與大躍進和大饑荒之間的因果關係，並記述這一時期計生政策實施的具體過程。本文認為，1962年開始重啟的計劃生育，本質上是一個調解人口和資源之間矛盾的經濟措施，也是一場為了解決大躍進危局的政治運動。大躍進後重新開展的計劃生育，實際上成為一個如經濟命令般的人口生產計劃：由中央制訂好指標，下交給地方政府執行，民眾按照計劃指標晚婚、避孕、流產和絕育。政治動員自是政策實施利器。為了達標，國家權力開始以各種形式介入民眾的婚姻；部分地區甚至還建立了發揮監察作用的「月經卡」制度，對民眾性生活情況進行定期檢查。在這個過程中，參與計劃生育的每對夫婦和家庭都在用身體為大躍進和大饑荒的災難性後果買單。

關鍵詞：計劃生育 大躍進 大饑荒 人工流產 政治動員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計劃生育政策是從1950年代後期開始的。中國大陸學界主要把目光聚焦在1970年代之後的計生歷史，而對1960年代的計生執行情況研究甚少，基本停留在寬泛記述的階段^①；另有一些資料性質的工具書，大多是將中共領導人關於計生的講話和中央出台的計生政策文件按年代進行彙編^②。相關研究十分粗略：一是缺乏對當年計生政策實施層面上的記述；二是缺乏對計生政策與該時代其他歷史事件相關聯性的深入解讀，如把1962年底重新提倡的計劃生育簡單解釋為：「鑒於前幾年放鬆了節育工作，中央又重新考慮了提倡節制生育的問題」^③，缺乏學術意義上的深度探索。近些年關於1950至1960年代計劃生育的研究論文中，值得一提的是南京大學李嬌嬌的碩士論文〈「文革」前江蘇省的計劃生育工作〉^④，是目前少有的運用地方

檔案資料來還原當時計生政策具體執行情況的研究。但令人遺憾的是，這篇論文同樣缺乏對計生政策與該時代歷史事件複雜關係的探析，止步於對檔案資料的簡單複述。

西方學者對中國的計生政策很感興趣，相關的學術研究頗多，從人類學、社會學、政治學等角度進行深入剖析。但西方學界同樣聚焦於1970年代末至今的計劃生育，對此前年代的研究基本上處於空白狀態，僅有少數論著簡單提及1950至1960年代的情況^⑤，並提出了一些零星的洞見，如認為「1960年代重新開展的計生政策是為了平衡大躍進所帶來的經濟失敗」^⑥。而且，這些研究所用的資料多來自於中國出版的計生政策文件彙編，缺乏堅實詳盡的地方性史料作為支撐^⑦。

如上所述，共和國1950至1960年代的計生研究，還存在大量有待開拓的領域。事實上，1960年代計生政策的重啟與大躍進和大饑荒息息相關，但學界對此缺乏研究。本文將運用大量江蘇省檔案館館藏的計生檔案、同時代的《人民日報》以及當時的醫療雜誌，對以上問題進行探究。本文發現，1962至1966年開展的計劃生育絕不是一個獨立事件，其與計劃經濟體制、大躍進的失敗有着直接的關係，是之前一系列政治事件所導致的連鎖反應。這一時期的計生工作的目標在於減少人口出生率，以減緩大躍進造成的經濟危機，本質上是一個經濟決策。在實行的過程中，每一對參與計劃生育的夫婦都是受政權所支配的經濟變量。

一 經濟危機與政權危機

1958至1960年的大躍進，使中國的糧食和農副產品減產，城鄉人民的糧食與其他食品消費量降低，城市糧食供應緊張。及後發生的全國性大饑荒使大批人營養不足，產生浮腫現象，死亡的陰影籠罩着中國。1959至1961年，全國人口死亡率一直向上攀升，尤其在1960年人口死亡率超過當年的出生率，出現了中國歷史上極為罕見的人口負增長^⑧。

大躍進沒有使中國躍入烏托邦，反而使其跌入深淵，中國的經濟陷於崩潰的邊緣。災難的氤氳讓掌管經濟工作的中共高層十分焦慮，如劉少奇在1962年6月與田家英的工作談話中曾說：「現在情況很明瞭了，這樣下去，無產階級專政要垮台。」^⑨面對這種經濟危局，中共不得不採取一系列應急措施制止局面繼續惡化。其實，早在1962年1至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接連召開了著名的「七千人大會」和「西樓會議」，對經濟計劃進行緊急調整。在「西樓會議」上，以陳雲為代表的掌管經濟工作的中共高層強調，減少城市人口是應對經濟危局的根本性措施，若非如此，「財政繼續虧空，市場發生動亂……對於減人，大家一定要下定決心，否則沒有出路」^⑩。向來嚴謹寡言的陳雲做出此番決絕的講話，印證了當時局勢的危急，也說明了中共高層已經將減少城市人口作為一根救命稻草。此後，政府迅速「關停併轉」了一批在大躍進中興辦起來的企業，並將那些從農村招入城市的工人遣返原地。1961至1963年全國一共精簡職工1,800萬，壓縮城鎮人口2,600萬^⑪。

在政府竭力調整經濟計劃和精簡城市人口的同時，1962和1963年中國的人口出生率卻出現了反彈式的增長(表1)，其中1962年人口出生率達到37.01‰，遠超大躍進期間的出生率，1963年更是達到了43.37‰，是迄今為止中國人口出生率最高的一年。大躍進結束之後，饑荒和非正常死亡的陰影逐漸消褪，民眾的生活開始有了起色，心理上的安全感增加，所以結婚生子的數目也大幅增加^⑫，驟然出現了生育高峰；再加上非自然人口死亡率的降低，使得人口增長率有所提高。1962年人口自然增長為26.99‰，1963年自然增長率為33.33‰。

表1 大躍進前後中國人口增長情況，1958至1963年 單位(‰)

年份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出生率	29.22	24.78	20.86	18.02	37.01	43.37
死亡率	11.98	14.59	25.43	14.24	10.02	10.04
自然增長率	17.24	10.19	-4.57	3.78	26.99	33.33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鑒(1988)》(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88)，頁97-98。

呱呱落地的小寶寶的哭聲彷彿一道緊箍咒，讓中共政府極為頭疼：好不容易通過精簡人口才得以緩解的人口與糧食的供應矛盾，在生育高峰中又陡然提升。為了應對這種情況，政府把大躍進中受到冷落的計生工作重新提上工作日程^⑬。1962年3月28日，周恩來在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上對嚴重的經濟情況作指示，「目前的城鎮人口仍然過多，農業可能提供的商品糧食和其他農產品，供養現有的城鎮人口還有困難。……在城鎮和人口密度大的農村，要認真提倡節制生育」^⑭。12月18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出〈關於認真提倡計劃生育的指示〉，指出計劃生育「是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中既定的政策」，「鑒於最近幾年來放鬆了節制生育和計劃生育的工作，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認為有必要向各級黨委和政府重申重視和加強對這一工作的領導」^⑮。該指示如同發令槍，計劃生育被冠以「認真」二字，意味深長。顯然，計劃生育成了一個應對危局的重要措施。

再次發動的計生工作從本質上講是大躍進帶來的經濟危機所催生的，核心目的是通過減少人口出生率使人口和糧食的供求得以平衡。無論是從時間上看，還是從思路上看，中共中央重提計劃生育都是和「西樓會議」所制訂的經濟措施相一致，是精簡城市人口工作的一個延伸。所以「認真提倡計劃生育」的實質是為大躍進收拾殘局、幫助中共解決危機的一個經濟措施，其目標、思維邏輯都是經濟的。如陳雲所謂若不減少人口，國家將「沒有出路」的警告一樣，周恩來在1963年2月1日的工作會議上也強調說：「為了國民經濟、體育、教育、科學技術的發展，我們要提倡晚婚和節育。」^⑯許多地方官員在談及計生工作時，也反覆強調這是一筆「經濟賬」，如1964年江蘇的一個副縣長在當地的一次計生工作會上講：「工農業生產的發展與人口自然增長不相匹配，全縣每年增產一點糧食，都被人口增長抵消了……還有東台鎮集中八個月力量下放城市人口1,000多人，〔新生人口〕一年就彌補了這個數字。」^⑰大躍進之後的危局催促着中共以「重病下猛藥」的態度開展計劃生育。

二 政治運動化的計劃生育

大躍進後重新開展的計劃生育，實際上成為了一個如經濟命令般的人口生產計劃：由中央制訂好指標，下交給地方政府執行，民眾按照計劃指標晚婚、避孕、流產和絕育。正如1963年7月8日周恩來在人大常委會上所說：「我們要有一個發展人口的計劃，不能就這樣聽其自然……發展人口必須跟生產、教育、勞動力的安排等方面都聯繫起來，不可能孤立地發展。……光提倡不行，必須有計劃……」^⑩在同年9至10月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召開的第二次城市工作會議上，衛生部副部長徐運北對計生政策提出具體的方案：從1963年起將計劃生育列入國家和省市的計劃之內，在全國城市和人口稠密的農村提倡適齡結婚，即男子二十八歲以上、女子二十五歲以上結婚；並如同制訂經濟計劃指標一樣，要求在1965年把全國人口增長率由1962年的27.14%下降到20%左右^⑪。

經濟危機的緊迫性，催促着政府竭盡所能追求計生工作的高效。在1962年12月中共中央發布了計生指示後，從中央到地方迅速建立了一系列的主管計生工作的機構，動用行政力量去完成計生指標。1964年1月，國務院成立了計劃生育委員會，由國務院秘書長周榮鑫任主任委員，衛生部婦幼司司長栗秀珍負責技術指導工作。全國十一個省、專轄市普遍進行了計生試點，建立了垂直到縣級的計劃生育委員會（或小組），將計劃生育當做一項十分緊迫的政治任務來執行，做到「層層有人管，有人抓」^⑫。

但搭建計劃生育的機構框架僅僅是一個基礎性的準備，要想將計生政策的影響和工作效率最大化，中共必須祭出其獨門武器——政治動員。正如1963年第二次城市工作會議紀要明確要求的：「各級黨委和人委把計劃生育工作列為重要議事日程之一，一年抓幾次，在全國形成一個計劃生育的群眾運動。」^⑬政治動員，是指共和國政府運用人力資源來為權威服務的過程^⑭；運動治國是毛澤東時代共和國政治的一大特色。運動模式能夠透過行政力量調動大量人力物力，短時間內就像徵集軍隊一樣建立起浩大的計生工作隊伍，立竿見影，其效率之快是其他社會動員方式無法企及的。多年來，中國的政治運動都遵循着類似的基本模式，而運動初期往往圍繞某些寬泛的主題（如反腐敗、反美、反右派、促進農業化）進行動員。中央和地方政府都相信用「運動」和「抓」的方式，可以迅速達到節制人口生育的目的。

以江蘇省為例，1963年江蘇省委開始領導衛生、婦聯、工會、共青團、教育、文化部門的多方力量開展工作，提出計生運動要大搞宣傳，形成社會輿論，使計劃生育真正做到家喻戶曉，在全省範圍內形成一個群眾運動。隨後，絕大部分的市、區、街道、大中型企事業單位紛紛建立了領導組織，定期討論及安排計生工作，各級組織將計生宣傳做到逢會必談，全面開展晚婚等計生宣傳，運用市、區的宣傳陣地和不同的會議形式，根據不同的對象反覆進行宣傳教育。江蘇省衛生廳在1963年的計生宣傳次數達到110,209次，全省2,557,627人受到教育。同時，江蘇省培訓基層婦女代表、女工委員、家屬委員、婦女隊長、共青團員、紅十字會衛生員及其他群眾積極份子，使他們

成為計生宣傳骨幹²³。僅1963年，江蘇省就培養計生宣傳骨幹118,070人²⁴。這些宣傳骨幹或深入田間地頭，或下礦進場，或走街串巷，將男女人體掛圖、幻燈片在公共領域展覽，向民眾宣傳計劃生育的好處、進行政治覺悟教育、講解生育知識、動員男女青年晚婚，最後還要推銷避孕工具。這些宣傳工作促使避孕套的銷量大增，1963年推銷避孕套319萬個，1964年銷售500萬餘²⁵。此外，江蘇省通過短期集訓和培訓班的方式在短時間內培養出巨量的計生技術骨幹，僅1963年就培養了28,588名，負責指導民眾避孕和執行手術，使得計生手術量攀升，1963年全省共作計生「四項手術」（人工流產、男子輸精管結扎、女子輸卵管結扎、放置節育環〔上環〕）77,022例，1964年達到357,849例，1965年達到179,712例²⁶。

此外，國家權力開始以各種形式介入民眾的婚姻，從而達到減少人口出生率的目的。為了推廣晚婚，1963年江蘇省政府重新界定了關於結婚年齡的規定：「一般結婚年齡男子在27-30歲，女子在23-26歲比較合適。青年的科學技術和藝術工作者在自己的專業方面深造打下基礎，還應該將結婚年齡推遲些。如戲劇演員、運動員一般應在30-35歲結婚，大專學校的助教、廠礦的技術員、醫院的醫師、護士、助產士及其他中級技術人員一般應從事3-5年實際工作後再結婚。」²⁷如果民眾不遵守政府新制訂的晚婚政策，將會受到懲罰。例如1963年天津市政府對不符合規定年齡結婚的夫婦，商業部門不予供應結婚的計劃物品，機關單位不予提供宿舍，人事部門不予照顧愛人關係而調動工作；此外，自該年起，中高等學校學生在校和實習期間不得結婚，否則勸其退學²⁸。同時，對結婚的生理條件也設置了更苛刻的門檻，江蘇省政府規定心臟病、高血壓、支氣管炎等十三種疾病患者暫不得結婚，所列病症甚為寬泛，甚至內分泌失調的人都列入其中²⁹。

部分地區甚至還建立了發揮監察作用的「月經卡」制度，對民眾性生活情況進行定期檢查。以江蘇省計生模範東台鎮為例，全鎮十七個居民委員會的婦女主任要清楚掌握轄區內育齡婦女的月經情況，定期檢查夫妻性生活中使用工具、藥物的情況和效果。「月經卡」制度使政府對下轄民眾的性生活情況全知全覺，能在第一時間偵緝到婦女的懷孕情報，然後「千方百計的動員其人工流產」³⁰。如東台鎮金墩居委會的王惠林了解婦女盧秀玲月經未來，並發現她飲食不正常，向鄰居討醬豆吃，調查後發現她果然懷孕了，便立即動員她做人工流產³¹。依靠「月經卡」制度，1964年東台鎮有生育能力的3,138名婦女中，避孕和絕育者達到2,071人，其中433人做了人工流產³²。

值得注意的是，1962年重新開展的計劃生育將重點放在城市。雖然城市人口在總人口中不佔大比例，但科技、工業、文教、衛生等重要資源都匯集在城市中，城市是國家運轉的軸心，力保城市穩定是中共執政方針的一條紅線，所以計生工作開展的重點地區自然集中在城市，而不是糧食更為短缺的農村地區。1963年召開的第二次城市工作會議，專門研究了計劃生育作為城市工作的重點，提出了降低城市人口自然增長率的目標³³。在中央的政令下，一張既廣且深的計生網在中國的城市火速鋪展開來。在地方上，自政令發布之後，各直轄市和多數省先後成立了計生領導小組，全國有2,000人左右

的專職行政人員。到了1965年，計生工作在「全國大、中、小168個城市，基本上抓起來了」^④。

天津、上海等大城市是開展計生工作的重點地區。天津市為了鼓勵民眾節制生育，從1963年開始提供免費人工流產、絕育手術；1963至1964年結扎和上環303,990例，人工流產123,760例^⑤，數量驚人，是各省市學習的範例。上海在縣、區、街道乃至里弄都建立了計劃生育推廣委員會（或小組），由黨委書記當主任，街道上的街道主任、婦委書記、團委書記、派出所長、醫院院長都是推廣委員會委員，可見行政力量全面而強大。上海市委提出了「晚、稀、少」的生育原則，要求城市夫婦生育子女要控制在兩到三個內，每胎相隔四至五年。隨後上海各區、街道、工廠的黨委都相應制訂了所轄範圍的生育指標，按指標推行計生工作，但指標不向群眾公布。1962至1964年上半年，上海有6.4萬育齡夫婦做了節育手術，出生率下降很快，得到了中央的讚賞^⑥。

自1949到1963年，中國城市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長率都高於農村，1954至1958年城市平均出生率為39.80‰，縣以下地區為32.34‰；城市人口自然增長率為31.30‰，縣以下地區為20‰^⑦。正如中共在國共內戰時最擅長的大兵團作戰，集中力量打擊核心目標，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高度關注下，中共的行政和動員的巨大力量再次展露，計生工作在城市取得了決定性勝利。1964至1966年三年間，由於政府大力運用政治動員手段控制城市人口，使得全國城市人口的出生率和自然增長率顯著下降，降速遠高於農村（表2）。加之大躍進之後的經濟恢復和農業增產，城市的糧食危機平穩度過，潛在的政治危機也消除了。正像周恩來在1964年12月21日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所宣稱的：「調整國民經濟的任務已經基本完成，工農業生產已經全面高漲，整個國民經濟已經好轉，並且將要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⑧

表2 中國城鄉人口增長情況，1964至1966年 單位(‰)

年份	地區	出生率	自然增長率
1964	城市	32.17	24.90
	縣	40.27	28.10
1965	城市	26.95	20.90
	縣	39.53	29.47
1966	城市	20.85	15.26
	縣	36.71	27.24

資料來源：路遇主編：《新中國人口五十年》，下冊（北京：中國人口出版社，2004），頁1001。

中共領導人和政府傾向用大規模的群眾運動，以突擊方式在短時間內解決某個問題，但通常這樣疾風驟雨式的運動往往缺乏穩定性和規劃性，有的運動是在給前一個運動的失敗打補丁、堵漏洞，1960年代的計生運動實際上就是為大躍進運動的失敗堵漏洞。依靠強大的行政力量和密不透風的社會組織來強力推動一項政策的實施，不少時候雖然效率極高，但是「抓」與「運動」

的工作模式有其簡單粗暴性。正如1965年江蘇省官方總結兩年間計生工作的報告裏寫到：部分地區產生了片面追求手術數量和硬性要求降低出生率的傾向，因此在工作方法上出現提指標、壓任務層層加碼的現象。為了使手術數量達標，強行對思想不認同的群眾做手術。在這樣的情況下，定指標、喊口號、競賽式的現象就開始出現了。有的地區領導為了達到降低出生率的政治指標，硬性規定節育措施，如提出有三個孩子以上的家庭都要做絕育手術。為了追求政績達標，有的地區不顧手術條件，強行進行手術³⁹。

三 瀰漫在農村工作中的「唯意志論」

雖然1962年開展計生工作的絕對重心在於城市，但在城市已經取得顯著成效之後，計生工作開始逐步向部分農村延展。

以江蘇省為例，1964年6月到1965年1月，計生工作重心由城市向農村擴展。1965年1月之後，農村計生工作全面開展，全省農村共有677個醫療單位開展節育手術，能施行節育手術的技術人員達1,400人。此外，江蘇省1965年派出170組醫療巡迴隊，每隊配置8至12人，其中配備內、外、婦產、兒科的主治醫師及護士各一名，另外配備隊長或副隊長一名擔任政治和行政的工作；選擇能施行結扎輸精管手術的外科醫師、能施行人工流產和放置節育環手術的婦產科醫師或助產士參加醫療隊，以便開展手術。1965年第一季度江蘇農村共作「四項手術」102,040例，城市為77,672例，這是計生政策重啟之後農村的手術數量首次超越城市⁴⁰。

1964年，隨著「四清運動」的深入，毛澤東對官僚主義、反修防修的問題看得愈來愈重，對醫療部門也頗為不滿，在6月和8月兩次批評北京醫院是「老爺醫院」，脫離群眾⁴¹。1965年著名的「六二六指示」中，毛更嚴厲批評衛生部是「城市衛生老爺部」，「輕視農村的醫療衛生工作，只留在城市大醫院中戴起大口罩，隔斷了基層民眾的聯繫，冷落了人民群眾的感情」。毛強調「現在那套檢查治療方法根本不適合農村，培養醫生的方法，只是為了城市，可是中國有五億多農民，要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提出了在農村培訓不脫產的衛生員的總構想，強調要降低鄉村醫生的門檻：「書讀得越多越蠢，醫學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讀那麼多書。華佗讀的是幾年制？明朝李時珍讀的是幾年制？醫學教育用不着收甚麼高中生、初中生，高小畢業生學三年就夠了。」⁴²

在「六二六指示」之後，農村計生工作得到進一步推廣。1965年11月2日至4日，國家衛生部召開會議着重學習了中央關於把衛生工作放到農村的指示：會議認為過去幾年計生工作雖取得明顯成績，但廣大農村，除了河北、山東、浙江、福建等省大部分地區開展工作外，其他各省均在試點階段。今後衛生部門應在各地黨政領導下，對人口稠密的農村積極組織力量，結合醫療隊下鄉推廣試點工作的經驗；組織參加農村巡迴醫療隊的醫務人員學會計生宣傳及一般技術指導，其中的醫生，尤其是婦產科、外科醫生，都要學會

三四種節育手術^③。而且衛生部強調農村的計生工作要「政治掛帥」，結合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以階級鬥爭為綱^④。

雖然表面看起來計生工作開始從城市向農村順利地拓展，但實際上，在農村大規模開展計生工作面對非常多的客觀條件困難和限制——手術環境的惡劣、藥具和器械的短缺、技術人員素質和數量的欠缺、民眾醫學常識的匱乏，這些客觀存在的問題都說明在農村驟然實行大規模計生工作並不適宜。但在毛澤東「政治掛帥」的思維裏，這些問題不值一提。毛儘管一直自稱唯物主義者，但他畢生相信「唯意志論」，如美國學者馬思樂(Maurice Meisner)認為，毛主義的世界觀「以極端唯意志論」為特徵^⑤，相信被適當動員起來的群眾實際上可以戰勝任何物質困難。基於這種世界觀，當「政治掛帥」成為推動計生工作背後的核心思想時，整個運動就愈發脫離科學和專業精神。嚴謹的醫學理念由於強調嚴格的醫療環境與條件，客觀上阻礙了追求數量的計生運動，所以被斥為「強調條件」、「陳規舊習」^⑥。在「政治掛帥」的旗號之下，農村計生工作在不適宜的條件下強行上馬，手術程序和標準被一再降低和簡化。

例如1964年江蘇省衛生廳制訂了計生手術的消毒程序，其中規定：手術室一星期至少用紫外線燈或乳酸蒸汽進行兩次空氣消毒；醫務人員要對手部進行三道程序消毒後方能進行手術；手術前準備好無菌器械台，手術工具要經過高壓蒸汽或開水煮沸消毒^⑦。但在農村地區的實際操作中，由於手術量大，人手短缺，物資匱乏，手術大多沒按衛生廳所制訂的標準執行，就連消毒這一最基本的程序都很難按標準操作。當時農村計生手術的消毒方式普遍極其簡陋，甚至存在將醫生用過的廢液給患者進行消毒的現象^⑧。如此粗陋的手術條件定會使患者感染概率大增。根據徐州專區的報告，1965年第一季度該區做上環手術9,589例，其中三分之二是在生產大隊做的，由於設備和消毒條件不達標，許多婦女在手術後反映腰酸、小腹痛和其他婦女疾病增多。還有的地方用來消毒手術工具的蒸籠溫度不夠，連雞蛋都蒸不熟，在根本起不到消毒作用的情況下依然進行手術，許多患者在接受手術後腰酸背痛，醫務人員卻說是由於患者的心理因素造成的^⑨。

此外，農村醫療單位普遍經費不足，部分手術器械特別短缺。以江蘇省為例，節育手術的器械供不應求，尤其是窺陰器、海綿鉗、蚊式鉗供應十分緊張^⑩；基本沒有無影燈和消毒用的紫外線燈，打着手電筒照明進行手術和用大鍋煮手術用具成了農村的正常現象^⑪。以農村計生模範海安縣的情況為例，當地的手術台是用木板和課桌拼成，有的高低不平，還要在桌下墊上磚頭。手術室內沒有專用的無影燈，連電燈都沒有，只能採取自然光——手術台南北方向放置，上午進行手術時將患者頭朝向北，下午將頭朝南。冬天手術室內還要生爐子，室內手術人員為防止一氧化碳中毒要每二小時出去透風一次，屋內甚至有煤煙^⑫。在如此簡陋、不標準的條件下進行手術，卻被中共官方表揚為「學習和應用了毛澤東思想，糾正了唯條件論，因陋制宜，土法上馬」，證實了「人的因素是第一」^⑬。

此外，農村醫務人員嚴重短缺也是一個實在的問題，在經濟落後的地區更是突出。除了讓各市縣組織醫生下鄉巡迴進行手術外，江蘇省委又「政治掛

帥」意識高漲，稱「不能讓各種條條框框束縛住手腳，決定今後必須採取革命的辦法，多快好省地培訓擴大農村醫務隊伍，試驗培訓半農半醫的衛生員掌握一兩項計劃生育手術，做到人工流產、放環不出公社，男結扎不出地區醫院，四項手術不出縣」^⑤。在1965年一年間，就在全省農村677個醫療單位開展節育手術，將施行手術的技術人員擴展到1,400人^⑥。江蘇省政府所謂打破「條條框框」的行為，讓「半農半醫」的衛生員經過短期培訓就上馬施行計生手術，是完全沒有經過嚴謹、細緻考慮的。諷刺的是，海安縣技術人員邊學邊做手術的不專業行為，還得到了江蘇省政府的讚賞，稱其為「就地培養，又快又好的拉出一支計劃生育手術隊伍」^⑦。

就在這種一切條件都不成熟的情況下，如前所述，1965年第一季度江蘇省農村居然完成了102,040例計生手術，這個數字宣告着「唯意志論」和「政治掛帥」的勝利，其背後的故事是讓人心有餘悸的。江蘇省農村計生工作的情況只是其時的一個縮影，在當時「政治掛帥」氣氛瀰漫的社會，類似的例子可以在專業的醫學雜誌、報刊上隨意看到。如廣州部隊總醫院醫療巡迴隊宣稱：「只要能發揚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精神……充分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就可以克服困難」，於是在條件簡陋的環境下不斷簡化手術程序^⑧。再如南昌市的一個「克服客觀困難」典型的下鄉醫療隊，為減少下鄉做節育手術時攜帶物品過多和節約物資，用廢報紙代替布巾給患者消毒，並取消手術前後的檢查制度^⑨。

在這些例子的話語和邏輯中，隱約散發着那熟悉的「放衛星」味道。許多非專業乃至荒謬的觀點大行其道，科學理性和醫學的嚴謹性被「政治正確性」所取代。比如，江西的一位助產士1965年參與農村醫療巡迴隊，到了農村才發現大隊裏沒有婦產科醫生，結果這個助產士便擔當起了醫療的重任。有貧農來找她要求做人工流產，但她從來沒有做過刮宮手術，不敢做。後來她想到了毛主席的教導，要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毛主席的話給了她極大鼓舞，經過一些專業自學和向隊裏的同志請教、開始多方面的學習之後，她便開始給農民治療婦科疾病、安放避孕環、進行人工流產。這個助產士的例子被江西醫療界當成正面宣傳的典型，大張旗鼓地表揚^⑩。

此種例子之多，不能一一列舉。這些當時被報導和樹立的醫療範例，核心思想都是講，只要心存「階級感情」和「毛澤東思想」，醫務工作者就能克服條件上和技術上的困難，完成一個又一個計生手術。由此，嚴重缺乏醫學常識的農村民眾就在這種懵懂的狀態下被一級級的官員驅趕到手術台上，在粗陋環境中接受肉體的改造，忍受着手忙腳亂的稚嫩醫生的試錯，用肉體證明着「政治掛帥」這個偽命題。

四 人工流產：實用主義的選擇

在中共政府急切實行人口計劃生育過程中，「四項手術」是控制人口出生的重要手段，人工流產成為其中最重要的措施。在1962年底中共政府提出「認真提倡計劃生育」之後，1963年10月11日，衛生部廢除了1957年頒布的人工

流產的條件規定，制訂了新的標準。老版本規定懷孕三個月以上的孕婦不得做人工流產，而新規定把懷孕期限提高到了五個月；老規定限制婦女兩次人工流產的時間一定要隔一年以上，而新規定則對一年的間隔期持模稜兩可的態度；老規定對於人工流產的態度還是審慎的，強調醫務工作者一定要事前對申請人工流產的婦女說明該手術的風險和危害，講清道理，盡量說服其避免手術，並且申請程序比較複雜，要經過醫院和孕婦單位的審批，而在新規定中這些程序都被大幅簡化了^⑩。這一對比可以清楚地顯示中共政府在1963年對人工流產的態度是從快從鬆的，希望提高人工流產的速度和數量，以實用主義的態度將人工流產視作一項能夠減少出生率的有效手段。但新規定中放寬婦女做人工流產的時間間隔、提高孕期限制，都是對孕婦大有危害的舉動。

刮宮流產術是當時最常採用的人工流產方法。雖然刮宮術並非複雜的大手術，但其操作的難度和危險性，需要經驗豐富和心理素質優秀的醫生才有把握實施；而且醫生要親手將胎兒從孕婦體內刮出，過程比較血腥，對醫療工作者來說在心理上有一定衝擊。所以醫生對人工流產有看法，有的怕做多了病人會子宮穿孔，還有的年齡大的醫生認為，已經懷孕了再做人工流產手術不人道^⑪。江蘇省衛生系統內部檔案記載，「一些醫生和護士甚至想盡方法故意躲着不做人工流產，稱再做下去要出神經病了」^⑫。

正因為人工流產的風險性，即使手術環境好、醫生經驗豐富、消毒和手術前檢查準備充分，也不能保證人工流產不出問題。北京同仁醫院是當時中國最頂尖的醫院之一，該院對1955、1956年做人工流產的61位婦女進行了信件調查，30位婦女回信，其中2人無原因大出血及休克；3人第一次刮宮不淨，做了第二次手術；3人患上盆腔炎；1人月經不調^⑬。就是說，當時中國設備最好、醫生素質最高的醫院，在30例人工流產中也有9例出現不良後果。

隨着1963年中央放寬人工流產限制的政策迅速被地方所掌握，各地的人工流產數量火速攀升。天津市1963至1964年做人工流產123,760例，吉林省1963至1965年做人工流產83,351例^⑭。江蘇省1963至1965年第一季度做人工流產261,514例^⑮。僅南京市婦幼保健醫院一家，在1963年1至10月就做了人工流產2,464例^⑯。相比之下，1956年北京全市人工流產只有1,593例^⑰。根據南京、無錫、蘇州、常州四城市的統計，1961年四市人工流產的總數為3,838例，1962年為4,188例，到了1964年這個數字暴漲至14,262例^⑱。但地方上的醫療人員和醫療設施都很短缺，難以應對暴漲的人工流產手術數量。

針對這個局面，地方政府和醫療部門採取了一些「便宜行事」的辦法，這些辦法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人工流產手術的標準。1963年，江蘇省的城市醫院專門精通人工流產的醫生人數很少，在常州、蘇州、揚州、南通、鎮江15個市級綜合醫院中，只有3個醫院有專人負責人工流產。縣的情況更糟，全省62個縣醫院中，有41個醫院連從醫學院校畢業的婦產科醫生都沒有。為了解決計生技術人員短缺的問題，江蘇省衛生廳開始了擴軍式醫療人員的培訓，採取辦訓練班、臨牀實習、師傅帶徒弟等方法培訓中等技術水平的醫士。部分縣醫院在實踐中讓經過短暫集訓的助產士和剛畢業的醫學院學生主刀人工流產手術。至1965年，江蘇省共有795個醫療單位開展人工流產手術，節育技術人員1,400多人^⑲，但醫務人員人數仍然不能滿足工作需求。所以同年江蘇省

委提出：技術特別薄弱的地區，可以試驗培訓「半農半醫」的衛生員掌握一兩項手術^②，亦即不斷降低手術人員的資格標準。

如此降低標準的大擴軍，使得大批水平不達標的醫務人員倉促站到手術台旁。正如1963年江蘇省衛生廳的內部報告所說：「除了南通、蘇州地區醫療基礎比較好外，一般縣、區醫療機構的技術水平過不了關。」^③如前述北京同仁醫院的例子所示，連當時中國最好的醫院裏的醫生做人工流產手術都不能有把握做到完全無風險，由這些技術馬馬虎虎的新手主刀，勢必會增加手術事故率。江蘇省衛生廳的檔案裏記錄了一些由於手術人員技術不過關的事故：

沙洲縣的一個助產士做人工流產手術時將孕婦的腸子拉出二尺多長，送到無錫市搶救才得以脫險。^④

1963年7月6日常州周行公社39歲季姓女子至周行公社醫院做人工流產手術，手術主治醫生王某在手術過程中簡單粗暴，並讓實習生操作，導致患者子宮穿孔，但當時並未發現。術後患者在住院期間腹部劇痛，但王某對其護理並不上心，認為是小情況，導致患者病情惡化，不得不在四天後對患者進行子宮切除手術，術後四天患者病情惡化死亡。^⑤

事實上，中國的知識界和醫學界一直對人工流產有強烈的爭論，康同壁、馬寅初等著名學者和林巧稚、嚴仁英等醫學專家在1957年曾公開強烈反對人工流產，理由一是人工流產過於殘忍；二是以人工流產作為降低人口出生率的方式是治標不治本的；三是以當時中國的醫療條件並不足以開展大範圍的人工流產手術，會給婦女帶來嚴重傷害^⑥。在1962年以後計劃生育實施的史實中，可以發現當時的醫療人員和醫療物資不足以完全支撐住如此大量的人工流產，由此不僅降低了手術標準，還給婦女帶來傷害。這完全印證了1957年醫學界專家對於放寬人工流產手術的憂慮。不過，經歷過1957年反右運動的風暴之後，知識份子的話語權力和話語平台都被剝奪了，醫學界和其他領域的知識份子不能也不敢再對人工流產提出異議。翻看曾經大量報導醫學專家不贊同人工流產的《人民日報》，當會發現1962至1966年間再也沒有關於人工流產正當性和危險性的爭論，也無對各地實踐中降低手術標準的批評。被噤聲的知識份子只能默默注視着大量不合乎醫療標準的人工流產在婦女的肉體上實施，默默注視着醫學專業被政治權力所挾持。

五 結語：中國的「馬爾薩斯夫婦」

隨着農業的恢復，1965年中國的糧食產量達到1.94億噸，已經接近大躍進前1957年1.95億噸的產量^⑦。同時，計劃生育和精簡城市人口政策也得到了高效落實，人口與糧食間的失衡不再那麼尖銳。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奪權運動，使各級政府機關被砸爛，陷入癱瘓狀態；各級計生部門也同樣被砸爛，一部分幹部人員被扣上「走資派」、「修正主義份子」的帽子，被關入牛棚，節育技術人員大部分被下放到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由於派系之間的政

治鬥爭，計生工作在文革中被政治新貴斥為「修正主義」，其中江青將計生工作稱作「婆婆媽媽的小事」，「抓計生」被定性為「管、卡、壓」的修正主義路線^⑥。在這種失序的情況下，1962年開始實行的計劃生育於1966年基本終止。

1962至1966年的計劃生育，本質上是一個調解人口和資源之間矛盾的經濟措施，也是一場為了解決大躍進危局的政治運動。它的目的是經濟的，而手段則是政治的。由此，計劃生育上升為一項由國家發起的、廣大育齡人群參與的，有組織、有目的地改變自然生育行為的政治運動。只有在共和國這樣權力高度集中、國家權力能夠控制個人生活每個角落的國家，才能發起這樣大規模的計生運動。

在計劃生育實施的史實中可以看到一個矛盾的現象。毛澤東時代是一個性觀念極端保守的時代，由於共和國獨特的意識形態，社會上瀰漫着「禁欲主義」(asceticism)^⑦。共產主義道德的高度革命性和烏托邦色彩，使「性」成為一種禁忌和醜陋的原罪。代表男女間欲望、感情的「性」，被完全驅逐出公共話語領域。但是，各地在計生宣傳中無不大張旗鼓地進行介紹，宣傳骨幹細緻地向民眾介紹避孕措施，甚至對沒有任何性經驗的學生進行公開宣傳，毫無遮擋和避諱。共和國早期「性」的話題在這似乎形成了一個悖論：即一方面是嚴防死守，作為禁忌的「性」；另一方面卻是大張旗鼓宣講的「性」。

這個悖論，反映了在權力高度集中、意識形態高度單一的共和國社會裏，「性」的話語和意義完全由權力進行界定。「性」被割裂成一個雙層的概念，一方面是受到國家掌控，可以放在公共視野下宣講的，作為人口生產的性；另一方面是作為男女間私人的、歡愉的性。在前者的主導下，男女間的性行為完全被剝離了私人的生理屬性，沒有歡愉，只有人口生產的社會屬性，是一個完全工具性的概念。國家通過對人口進行宏觀的控制，以實現其政治經濟目標。

在這個割裂的過程中，民眾被訓誡和規範，國家的權力效應沿着一個漸進的細微渠道流通，深入到每個人的全部日常行為、抵達了他們私密的臥室、操控着他們的肉體和器官。人們的性行為和生育雖然出自自己的身體，卻在冥冥中受到國家意志的擺弄，他們是受國家權力操控的人口工廠流水線上的一對對工人。福柯(Michel Foucault)曾把這種現象戲謔而精準地定義為「馬爾薩斯式夫婦」(the Malthusian couple)，即生育演化為社會生產手段，而非人的生命活動的本質表現。這個體系的邏輯是：「權力是用其存在的理由及其運作的邏輯管理生命，而不是用人道主義情感的。」^⑧

所以在1962年開展的計劃生育就像一個生產計劃，由中央政府憑着「經濟理性」制訂了一個宏觀的指標，經一級級的官僚政府傳達，一對對「馬爾薩斯夫婦」是這個計劃的終端和具體生產者。在醫學外殼下的避孕、生育、人口實質上都是經濟要素，簡化成一張遞送給計劃經濟委員會的統計表，在這張表上，人口的生命價值變成了一個個數學意義上的符號、數值和曲線。當災難性的經濟危機驟然出現在中國這一巨輪面前時，中央計劃委員會的經濟舵手選擇拼命地調整船上的各個按鈕，以圖避免巨輪毀滅，而人口控制就是其中的一個按鈕。在這個意義上，人口出生率作為一個經濟數據需要被迅速降低，統計學上的減法從中央通過行政官僚系統層層傳達到地方，最終到達每

一個家庭，在這個傳遞過程中抽象的經濟學數字被逐漸地還原為其原本的生理學形態——即避孕、節育手術和人工流產。為避免經濟崩潰的經濟措施最終落在一個個被醫學改變的肉身之中，在這個意義上，不知不覺間，參與計劃生育的每對夫婦和家庭都在用身體為大躍進和大饑荒的災難性後果買單，這是個連續劇式的悲劇。

註釋

- ① 孫沐寒：《中國計劃生育史稿》（長春：北方婦女兒童出版社，1987）；史成禮編著：《中國計劃生育活動史》（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88）。
- ② 彭珮雲主編：《中國計劃生育全書》（北京：中國人口出版社，1997）；楊魁孚、梁濟民、張凡編：《中國人口與計劃生育大事要覽》（北京：中國人口出版社，2001）。
- ③④⑤⑥⑦ 孫沐寒：《中國計劃生育史稿》，頁120；128-29；129-33；129；134。
- ④ 李嬌嬌：〈「文革」前江蘇省的計劃生育工作〉（南京大學碩士論文，2011），中國知網，<http://cdmd.cnki.com.cn/Article/CDMD-10284-1011126471.htm>。
- ⑤ Steven W. Mosher, *A Mother's Ordeal: One Woman's Fight against China's One-Child Polic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Company, 1993); Thomas Scharping, *Birth Control in China, 1949-2000: Population Policy and Demographic Development* (London: Routledge, 2002); Susan Greenhalgh and Edwin A. Winckler, *Governing China's Population: From Leninist to Neoliberal Biopolitic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Susan Greenhalgh, *Just One Child: Science and Policy in Deng's China*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8).
- ⑥ Susan Greenhalgh and Edwin A. Winckler, *Governing China's Population*, 75.
- ⑦ 詳見以下專著的文獻綜述：Susan Greenhalgh and Edwin A. Winckler, *Governing China's Population*, 10-12；Thomas Scharping, *Birth Control in China, 1949-2000*, 26-30。
- ⑧ 有關大饑荒期間的非正常死亡人數，歷來說法不一，普遍相信約在三四千萬左右。參見曹樹基：〈1959-1961年中國的人口死亡及其成因〉，《中國人口科學》，2005年第1期，頁14-27；楊繼繩：《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9），頁5；Frank Dikötter, *Mao's Great Famine: The History of China's Most Devastating Catastrophe, 1958-1962* (New York: Walker & Company, 2010), 10。
- ⑨ 轉引自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頁1229。
- ⑩ 陳雲：〈目前財政經濟的情況和克服困難的若干辦法〉（1962年2月26日），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五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216。
- ⑪ 王茂林主編：《中國城市經濟六十年》（北京：城市出版社，2009），頁2。
- ⑫ 1961年結婚婦女為467.6萬人，1962年為577.4萬，1963為507.9萬人，相比1959年的人數分別增加了37%、70%和49%。參見孫沐寒：《中國計劃生育史稿》，頁118-19。
- ⑬ 1953年6月共和國第一次使用科學方法開始全國人口普查，統計結果為中國大陸人口6.0194億。隨後中共領導人和知識份子愈發重視人口增長所帶來的壓力，普遍認為應該對人口增長進行控制。直至1957年10月，〈1956-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正式公布，其中第二十九條規定，「除少數民族的地區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傳和推行節制生育，提倡有計劃地生育子女」（參見《1956-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頁25）。這是中共首

次將計劃生育作為一項國策寫進了政府工作計劃中。在1957至1958年間，河北和山東等部分地區進行了初步的計生工作，但由於大躍進的影響，中共高層的人口觀念出現了反覆，這些試點基本處於廢止狀態。所以說，雖然在1950年代中期，中共政府就提出了「計劃生育」的概念，但在實踐層面上並不統一連貫，時而小範圍緩慢執行(1957-1958)，時而停滯(大躍進時期和文化大革命前、中期)，時而急行軍(1962-1966)，具有極強烈的不穩定性和不連貫性。具體參見孫沐寒：《中國計劃生育史稿》；《中國人口與計劃生育大事要覽》；Susan Greenhalgh and Edwin A. Winckler, *Governing China's Population*。

⑭ 周恩來：〈國內形勢和我們的任務〉(1962年3月27、28日)，載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周恩來選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頁380。

⑮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認真提倡計劃生育的指示〉(1962年12月18日)，載《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五冊，頁763。

⑯ 〈周恩來在華東農業先進集體代表會議上的講話(節錄)〉(1963年2月1日)，載《中國計劃生育全書》編輯部編：《黨和國家領導人論人口與計劃生育(50-70年代)》(北京：中國人口出版社，1997)，頁12。

⑰ 〈東台縣是怎樣開展計劃生育工作的〉(1964)，江蘇省檔案館，4018-003-1233。

⑱ 周恩來：〈應該確立社會主義人口論的正確觀點〉(1963年7月8日)，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經濟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頁509-10。

⑲ 〈關於認真開展計劃生育的方案——衛生部副部長徐運北在中共中央、國務院第二次城市工作會議上的發言〉(1963年9月18日)，載《中國計劃生育全書》，頁291。

⑳ 〈關於1964年計劃生育工作的情況〉(1965)，江蘇省檔案館，4018-003-1218。

㉑㉒㉓㉔㉕㉖㉗ 〈關於全省計劃生育工作情況和今後工作意見〉(1965)，江蘇省檔案館，4018-003-1218。

㉘ 湯森(James R. Townsend)、沃馬克(Brantly Womack)著，顧速、董方譯：《中國政治》(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頁102。

㉙ 〈江蘇省衛生廳關於1963年計劃生育工作的意見〉(1963)，江蘇省檔案館，4018-002-0611。

㉚㉛ 〈1963到1965年第一季度江蘇省四項手術人數〉(1965)，江蘇省檔案館，4018-003-1218。

㉜ 〈關於計劃生育工作的幾點意見〉(1964)，江蘇省檔案館，4018-003-0603。

㉝ 〈市人民委員會關於提倡「晚婚」和推行計劃生育幾項有關辦法的規定〉，《天津政報》，1963年5月21日。

㉞ 〈關於嚴格執行婚前健康檢查和規定暫不得結婚的幾種疾病的請示〉(1963)，江蘇省檔案館，4018-003-0966。

㉟㊱ 〈東台鎮計劃生育工作情況介紹〉(1964)，江蘇省檔案館，4018-002-1233。

㊲ 〈我縣是怎樣開展計劃生育工作的〉(1964)，江蘇省檔案館，4018-002-1233。

㊳ 〈關於計劃生育工作問題——國務院計劃生育辦公室主任楊振亞在湖南省第三次計劃生育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節錄)〉(1965年12月17日)，載《中國計劃生育全書》，頁295。

㊴ 路遇主編：《新中國人口五十年》，下冊(北京：中國人口出版社，2004)，頁1001。

㊵ 參見〈周恩來總理在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1964年12月21日)，中國人大網，www.npc.gov.cn/wxzl/gongbao/2000-12/24/content_5328407.htm。

㊶㊷㊸ 〈兩年來計劃生育工作成績和經驗(盛天任廳長在省計劃生育工作訓練班上的講話)〉(1965)，江蘇省檔案館，4018-003-1234。

㊹ 毛澤東：〈對衛生部黨組關於改進高級幹部保健工作報告的批語〉，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一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頁124-25，註釋1。

- ⑳ 轉引自鄧鐵濤主編：《中國防疫史》（南寧：廣西科學技術出版社，2006），頁582。
- ㉑ 〈婦幼衛生科處長座談會議紀要〉（1965），江蘇省檔案館，4018-003-1218。
- ㉒ 〈關於1964年計劃生育工作情況和1965年工作意見的報告〉（1965），江蘇省檔案館，4018-003-1218。
- ㉓ 邁斯納（Maurice Meisner）著，杜蒲譯：《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5），頁2。
- ㉔ 參見廣州部隊後勤部衛生部：〈深入海島 巡迴防治 促進思想革命化〉，《解放軍報》，1965年第6期，頁4-8；胡素平：〈在農村施行計劃生育手術的體會〉，《江西醫藥》，1965年第6期，頁822-23。
- ㉕ 〈江蘇省計劃生育訓練班培訓技術資料〉（1965），江蘇省檔案館，4018-003-1234。
- ㉖ 海安縣平等公社工作組：〈關於平等公社開展計劃生育工作中的有關政策和技術方面的幾個問題（討論稿）〉（1965），江蘇省檔案館，4018-003-1234。
- ㉗㉘ 〈江蘇省衛生廳關於計劃生育工作情況的匯報〉（1965），江蘇省檔案館，4018-003-1218。
- ㉙ 〈江蘇省衛生廳關於組織農村巡迴醫療隊的通知〉（1965），江蘇省檔案館，4018-003-1212。
- ㉚㉛ 〈農村簡易手術室的建立〉（1965），江蘇省檔案館，4018-003-1234。
- ㉜ 〈緊密結合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把農村計劃生育工作扎扎實實開展起來〉，江蘇省檔案館，4018-003-1295。
- ㉝ 廣州部隊後勤部衛生部：〈深入海島 巡迴防治 促進思想革命化〉，頁4-8。
- ㉞ 胡素平：〈在農村施行計劃生育手術的體會〉，頁822-23。
- ㉟ 黃琦莊：〈參加農村巡迴醫療的體會〉，《護理雜誌》，1966年第3期，頁126。
- ㊱ 1957年人工流產手術標準的文件，參見〈衛生部關於人工流產及絕育手術的通知〉（1957年5月15日），江蘇省檔案館，4018-002-0603；1963年新版本的人工流產手術標準的文件，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關於修改人工流產及男女結扎手術規定的通知〉（1963年10月11日），江蘇省檔案館，4018-002-0603。
- ㊲㊳ 〈南京市婦幼保健院計劃生育工作小結〉（1963），江蘇省檔案館，4018-003-0966。
- ㊴ 〈無錫市婦幼保健院1957年絕育工作小結〉（1958），江蘇省檔案館，4018-003-0395。
- ㊵ 〈非不得已不要做人工流產〉，《人民日報》，1957年3月9日。
- ㊶ 〈計劃生育符合社會主義〉，《人民日報》，1957年3月19日。
- ㊷㊸㊹ 〈江蘇省衛生廳1963年計劃生育工作情況的匯報〉（1964），江蘇省檔案館，4018-002-0611。
- ㊺ 〈各地有關計劃生育手術後遺症的來往文書〉（1967），江蘇省檔案館，4018-003-1361。
- ㊻ 參見〈用人工流產來節制生育是不適當的〉，《人民日報》，1957年3月18日；〈人工流產需要適當限制〉，《人民日報》，1957年3月25日；〈許多醫學家發表意見 不同意放寬人工流產的限制〉，《人民日報》，1957年5月26日。
- ㊼ 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鑒（1993）》（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93），頁364-67。
- ㊽ Maurice Meisner, "Utopian Goals and Ascetic Values in Chinese Communist Ideolog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8, no. 1 (1968): 101-10.
- ㊾ Michel Foucault,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trans. Robert Hurley, vol. 1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0), 99, 105.